

西方政治发展的逻辑：从中世纪到近代

陈明明

内容提要：政治发展首先要解决两大问题：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从西方政治发展的历史实践看，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与欧洲封建社会的性质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注意到中世纪欧洲封建组织形态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城市市民社会的生长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同时指出资本的运动必然与这一结构性特征发生尖锐的冲突。资本主义的发展要突破这种限制，一方面不能不通过市民阶级与王权的结盟来推动国家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则通过市民阶级反对王权的斗争来培育民族共同体，最终以新型的民族国家与个体市民之间的关系取代封建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是西方政治发展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面向。

陈明明：法学博士，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通讯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200433)

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罗马，这没有疑问。然而，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发展的逻辑与其说植根于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不如说奠基于中世纪社会结构内在矛盾的演展，在西方历史中，古希腊罗马与近代社会之间横亘着一个漫长的中世纪，而中世纪恰恰是古典文明的中断——日耳曼蛮族的铁蹄不仅扫荡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精神，也摧毁了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政治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言：“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起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缺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①对近代西方社会来说，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只是一笔封存在历史仓库的遗产。只有当人们认真发掘并擦拭掉

蒙在它身上的尘埃时，它才成为社会变革的有用资源，否则，充其量只是保留在少数知识精英心头的一份情愫，一丝慰藉，一种优越感，与近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没有直接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社会的历史是从中世纪开始的，因此，分析研究近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亦需要从中世纪入手。

一、封建制的产生及其特征

把对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的研究定位在封建主义、封建制度的基础之上，是启蒙学者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贡献。封建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00 页。

度固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动态,并不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也不意味着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在社会发展的序列上都要经过它。典型的封建组织形态出现在资本主义前的中世纪的西欧。

封建主义在西欧,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的整个欧洲,是与土地分封制相互联系的,而采邑制与农奴制则是这种土地分封制最初的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封建主之间时常发生战争,故而封建主不得不供养大批的家臣与亲兵,开始是让他们住在宫廷中,粮食、马匹、武器、装备由主人悉数供应。由于经济落后,运输不便,随着家臣亲兵数量的增长,封建主日益力不从心,不堪负担,于是转而按军功和忠诚把土地赏赐给他们,让土地耕种者为他们纳租服役,以供应其所需的一切。这种与封赏、恩典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叫做采邑(beneficium)。采邑制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封君封臣制。采邑的封授与受封之间的关系就是封君与封臣之间的关系。一个人被封予采邑,必须变成封授人即封君(也可以是次一级的封臣)的封臣,正所谓“我变成你的封臣是因为我领有你的封土”,领有封土则必须完成封臣义务,义务来自封土,如果没有把封土赐予封臣,也就无所谓君臣关系。正是从这种特殊的封土—采邑制中,我们看到西欧封建社会有别于其他农业社会的若干特征。

第一,等级性的土地所有制。西欧的封土是层层分封的,任何一个封建主都有权把自己受封的土地再转封给他人,条件是封土的接受者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这里关键是封君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占有和分封土地,而是以最高领主的私人身份分封土地,循此,各级封建主也依次以类似的名义进行再分封。由于层层分封,一块土地往往凝结了层层叠叠的权利和义务,与这

块土地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封建主之间也形成了同这些权利义务关系相对应的等级格序。等级格序的原则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他只有通过自己的封臣,才能联系到下一级封建主。反过来,每一级封建主只对直接的上级有服从义务,对间接上级则没有关系。

第二,契约性的身份系统。土地等级所有制实际上构筑了一种独特的身份依附系统。其独特性在于封君封臣的关系是以相互承担义务为基础的契约关系。契约的底蕴就是自主与志愿,其表现就是权利与义务。这由君臣关系的代际更新可以看出:受封人死亡,其继承人要向封君行一次臣服礼。“由于行了臣服礼,封臣对封君有多少忠诚,封君对封臣也就有多少忠诚。”^①有学者认为,随着采邑的世袭化,君臣关系的代际更新已毫无意义,因而这种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由契约关系是大可怀疑的。其实,采邑的世袭化的逻辑恰恰强化了君臣关系的私法意义,使君臣关系成为纯粹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加突出君臣关系的契约性质。这与东方农业社会那种君臣具有行政系统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是大异其趣的。

第三,独立的司法审判权。采邑世袭化就变成一种领地,凡领地皆有司法审判权。孟德斯鸠指出,国王对封臣领有的土地“是什么税也不征收的,国王对采地更不能保留他自己的赋税。取得了采地的人,在这方面享有最广泛的权利,他们从采地吸取一切利益,一切俸禄,其中最可观的一种,就是司法上的利益。”“因此,有了采地也就有了司法权”,它是“一种采地本身所

① M·Bloch, *Feudal Society*, London, 1962, p. 228.

固有的权利”^①。司法审判权的独立性与豁免权制度有关,所谓豁免权即意为免除,免除什么?免除国家官吏对领地事务的干涉。因此,豁免权实际上等于国王把各种行政司法职责交给封建主,由他代国王完成。这样,封建主的独立性越来越大。

第四,无君主主权观念的国家。我们可以以中世纪法国的国王为例。法王名义上虽是一国之君,但当时近代领土主权的概念并未产生,也没有土地国有或土地王有的意识。国王对其他封建主而言,只是一个宗主,既不能派遣官吏治理管辖其他封臣诸侯的领地,也不能征收赋税,只能以封建宗主的名义,享受封臣的军役、协助金等,以及执行扣押、监护、收回等权。作为一个最大的封建主,法王所看重的主要是其麾下有多少骑士,甚至连土地也是由此来认识,故一方面不断扩大王室领地,一方面又不断把土地分封出去。类似东方帝国的那种君主主权,他想都没想过。

封土—采邑制以及奠基于此的封君封臣制发展的结果就是王权的衰微。国王推行分权,本意当然是希望加强封臣与自己的关系,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是,随着国王的大肆分封和许多封建主变成国王的封臣,这些人也大量吸收封臣,既用以抗衡国王,也用以彼此争夺。事情到了最后,凡有一定实力的封臣也都吸收次一级的封臣。这样,在国王和臣民之间,由于插入了错综复杂的封臣层次,臣民只知有“主”,不知有“君”,臣民对国家的认同与义务变得十分陌生与疏远。国王的权力不仅被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分割,而且受教会制约,这也是欧洲封建社会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法国,“早期教皇们都声称自己拥有最高管辖权”,“教皇和主教都不受世俗政权的辖制”。在意大利,“教皇们表明自己是意大利最强有力的人物”^②。在英国,“国王威廉要在教皇的旗帜下才能进行征服,其

他封建国王也都要由教皇来承认他的君主权”^③。当教会对国王不满时,甚至可以颁布革除教籍令。这里除了宗教的传统使然之外,教会领地和职务的采邑化是重要原因。

总之,如果要给中世纪早期和中期的欧洲封建社会做一个政治结论的话,第一是它没有中央权威,它也不可能有中央权威,因为权威已经被封土—采邑制一层一层地截留和分散下去了,在任何一层都积累不起足够的政治资源,形成不了稳固的经济—政治共同体。第二是它缺乏政治整合,各个地区和基层单位脱离国家而独立,不受国家控制而存在。国家的意涵在这里只是领地,或是领地之间角逐利益的纯粹的地理空间,于是社会秩序遭到完全破坏,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与板块状的一元结构的东方社会不同,这是典型的“封建”形态——封邦裂土,封侯裂国,经济、政治各个领域都呈现出多元的结构,社会留下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缝隙。在这些缝隙中,由于相对脱离了结构性的强制,它理应生长出一些新因素,它确实也生长出一些新因素,这就是城市的兴起。

二、城市的兴起及其意义

说城市的兴起,并不是说在中世纪以前没有城市,罗马帝国就有城市,而且是很繁荣的城市。也不是说罗马城市被日耳曼人摧毁后,到中世纪后期才重新兴建起来,战争对城市有破坏,但不会把城市毁灭干

①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338—339 页。

② [美]威斯利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5 页。

③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 页。

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面世，一个新的社会逻辑的展开，正如汤普逊所言，“城市的兴起，论过程，是演进的，但论结果，是革命的。”^①

这种革命性首先表现在城市的经济性质方面，“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②城市许多行业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脱离了乡村和庄园的手工业形态，从而不断推动城乡的交换，刺激商业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居民松弛或割断了对土地的依赖，实现了与土地的分离，主要从事商业活动。显而易见，城市居民既然脱离了土地，那么与固着于土地相联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随之消失，由此获得了人身自由。因为，工商业的发展要求“保证商人和工匠可以往来和居住于他们所愿意住的地方，并且可以使他们自己和孩子的人身摆脱对领主权力的依附”^③。当然，这不是说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会立即导致人身法律地位的变化，“9—10世纪开始日渐明显的贸易复兴运动为城市居民的自由开辟了道路，然而必须注意到，即使是商人，自由最初也仅是一种事实，尚未得到法律的承认。”^④故而争取自由的权利，成为当时城市斗争的重要内容。这种斗争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诉诸暴力，举行起义，成立公社，最著名的当属法国的琅城公社；二是谈判妥协，达成协议，由封建主或国王赐予特权证书，获得成立公社的权利，大部分城市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自由的。

城市的经济性质不仅决定了城市居民的人身自由，而且决定了城市土地领有条件的自由。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自然经济统治的乡村，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与超经济强制相连，其领有条件具有明显的人身奴役性质。但在商品经济主导的城市范围内，土地作为城市居民的建

筑用地，逐渐进入流通领域而成为商品，土地的奴役性领有条件随土地性质的变化而趋消失。虽然有土地皆有领主，城市土地所有权名义上属于领主，但城市居民领有条件却是自由的。城市居民领有土地无需负担劳役义务，不发生人身依附关系，不受领主司法权制约，一般只需交纳一定的货币地租（到后来，土地上的货币地租也逐渐消失）。这与城市以外乡村社会通行的原则形成鲜明对照。城市居民对土地的自由权还不能视为资产阶级法律意义上的纯粹的私有财产，但其财产权利在他们取得合法的自由身份之后终被社会所承认当是不争的事实。布瓦松纳指出，城市居民“可以自由支配他们自己的财产，如同自由支配他们的人身一样；他们可以取得、占有、让渡、交换、出卖、馈赠和遗传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而不受领主管制”^⑤。这一点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西方政治理念中的自由民主的胚芽可以说就是植根于此。洛克认为，人生来即有两种权利，其一为人身自由的权利，他人无权支配，其二为继承财产的权利，他人无权干涉。出于保护自由和财产的根本考虑，人们就要组成政府^⑥。

城市政府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自治性，正因如此，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往往也被称为自治城市。这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1）司法自治。所谓司法自治，指城市摆脱领

① [美]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42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6 页。

③ [比]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05 页。

④ M·Postan 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3, Cambridge, 1963, P. 18.

⑤ [法]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16 页。

⑥ [英] 洛克：《政府论》下册，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16 页。

主司法权和传统法律的束缚,成立自己的法庭,制定符合商业关系的法律程序。城市是商业的基地,而不是象当时的东方城市那样仅是皇室堡垒,商业的逻辑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必须打破那种程序拘泥而狭隘的传统法律,诸如审判法,司法决斗等等,由于城市在名义上属于领主,因此司法自治必然也要求取消或限制领主对某种产品所拥有的专卖权和主持市场法庭(主要为收取罚金)的特权。这种权利对城市居民发展工商业害莫大焉。在中世纪的欧洲城市,都先后设立了独立于领主司法权的城市法庭,只有这样的法庭才有资格对市民和民事务进行裁判。(2)行政自治。城市在取得司法自治的同时,也开始了通过选举产生议会和公职人员,组织行政自治机构,建立独立的税收财政系统,自己管理城市事务的过程。在德国的城市,市场的控制权、贸易的控制权、对所有商品活动的监督权、对度量衡使用的规定权悉数转移到城市政府手中。城市居民还剥夺了领主的铸币权和对通行税的垄断权,直接税的征收也转归城市政府。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则成了著名的城市共和国,它们控制周围大片土地,拥有独立宣战、媾和、铸币等权利。几乎所有的城市,粮食供应、进口、销售价格均由城市政府管制。“在整个西欧,上层市民阶级一开始就垄断了城市政府。如果我们记得城市生活的主要基础是工商业,凡是促进了工商业的人,无可置疑地要支配城市生活,这个现象是必然的。”^①在商品货币关系广泛发展的城市范围内,司法自治和行政自治构成了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的法权体系,正是这一法权体系使城市在人身奴役关系广为存在的封建时代成为一方乐土,诚如德国谚语所言:“城市空气使人自由。”

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欧城市为什么在

它还很弱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如此强韧的生命力,而东方一些堪称发达的城市在上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却忍辱负重,无所作为呢?以司法自治而言,这是因为西欧封建法极不统一(这与东方迥然有别),司法机构重重叠叠,每个封建领主原则上都有组成法庭、审判属下封臣的权利和设定庄园法庭的权利。所以城市法的产生,城市作为独立司法单位的出现也就势所必然。再如行政自由。西欧政治分裂,诸侯割据,王权软弱,全国缺乏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大小封建贵族的领地行政独立,在这种背景下,城市要谋求发展,也必须保持同样的独立地位,城市行政自治由此而来。此外,西欧城市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与它本身在一定范围内满足封建领主开辟新财源,特别是现金货币来源的欲望也有关系。城市与封建领地在经济上彼此互为市场,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就使封建领主对城市的兴起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由是观之,说中世纪早期的城市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大体也不错,毕竟,就演进过程而言,城市是封建化的结果,没有这种软弱的王权和割据的态势,城市就难以生长与发展起来。然而,中世纪的城市又是寄生于封建体系内的异己物,它的生命冲动和内在品格使它始终游离于主体体制的壁缝之间,不断积累内部的能量,时而妥协,时而抗争,终于在封建农村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浮起星罗棋布般的市民社会的岛屿。汤普逊如是说:“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而在早期封建时代未曾有过这样的先例。”^②

^① [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

^②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27页。

城市市民社会是中世纪通往近代的桥梁。

现在,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性居民团体中逐渐地非常缓慢地产生出来的市民阶级在扩大商业交往、追逐利润的道路上已经迈开了历史性的一步,城市市民社会能否摇身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取决于它能否克服城市自身的封闭性,把城市的法则推向乡村,另一方面取决于它能否消灭领地分封,制止贵族割据,营造起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金融。它突然发现,以采邑制为基础的诸侯分立、政治分裂、权力分散的封建制度虽然曾为它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历史空间,但当它循着货币资本的运动逻辑欲走出城市时,封建制度却变成它的桎梏。货币资本要满世界奔走,市民阶级要旧貌换新颜,就必须打破这种桎梏,以新型的民族国家同个体市民之间的关系代替封建阶级之间的关系。

时代呼唤统一,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被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欧洲政治发展至为关键的一站。

三、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

然而,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的任务是市民阶级无法单独完成的,它需要借助某种力量。我们知道,当西欧被城市市民社会引领着步履蹒跚走到近代的门坎时,它的社会结构已经出现重大变化,形成了一种过渡时期的权力三角均衡态势,王权、贵族和市民按照各自的品格及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分别占据着权力三角形的一边,西欧社会发展的走向,则决定于这三者进行政治博弈的结果。王权代表着权力集中化的趋势,国王在诸侯战争中的首领角色以及在分封制中的宗主地位使他成为封建等级秩序中的最高一级封君,从理论上说,它具有比其他诸侯更多的合法性和更大的潜力

来执行“号令天下”的使命,因此对统一的权威和“国家”的理念有更多的欲求与体认。与王权不同,贵族代表着权力分散化的趋势。贵族的身份与尊严来自分封,在其领地上行使近乎完全的司法权和行政权使贵族把领地视为一个准政治单位,他的利益完全依赖于这种经济、政治和法律特权的独立性,故而贵族最理想的政治现状是割据。而市民虽然挟货币以自重,已经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但还嫌太弱,他要把城市的法则推向四分五裂的广阔的乡镇村野,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不依靠王权而反对贵族,在特殊情况下,又不能不与贵族结盟以限制王权。这就是西方政治发展早期的一个特质。

那么,市民阶级与王权合作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如上所述,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的母胎中发育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把封建的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这在西欧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这其实也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普遍要求。由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转变过程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先把农奴转变为自耕农或佃农,即解除农奴的封建义务,使其成为自由的独立小农;第二,再把自耕农或佃农转变为农业工人或雇佣劳动者,以便为日益扩大的资本主义经营提供充分的劳动资源。正是第一个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使王权与市民阶级找到了共同语言。需要指出的是,王权并非出于仁慈才要解放农奴,而是它不解放农奴就不能解放它自己。按照封建法律,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如不能自由离开主人,不能自由离开土地,不能自由婚姻,等等,法权上的这些规定含有具体的经济、政治内容,这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农奴要向贵族领主交纳赋税以及名目繁多的实物货币;其二,农奴要向贵族领主服兵役劳役,在诸侯武装

割据的年代,兵役尤为重要。然而,随着社会的演变、军事技术的变革、骑兵(通常由贵族担任)逐渐为步兵替代,贵族哪怕是谋划或应付一场规模极为有限的战争,其兵源都离不开束缚于其领地之上的农奴。这样,农奴制的存在就与王权的扩张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一方面,王权的统一事业需要越来越多的赋税与兵源,另一方面,赋税与兵源却被贵族领主所截留。王权如果不打破封建农奴制,变农奴为自由农民,变农奴经济为自耕农经济,中央集权的政体就无法实现。反过来说,自由农民一旦可以为王权提供赋税与兵源,它也就变成中央集权政体的经济基础。尽管市民力量增长的机制与王权扩张的机制是不相同的,但是,市民力量的增长标志着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战胜领主经济,王权的扩张则导致对封建领地的不断破坏,二者作用的结果是相似的。

王权的扩大及至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是经由两个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王室领地的扩张消除诸侯割据,二是通过扩充国王的实权剥夺诸侯权力。有的学者认为,国王拥有的权力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王在封建领主制的政治秩序中依其宗主地位拥有宗主权,它具有私权的性质,用以制约国王与贵族附庸之间的私人关系。前面提及的封君与封臣的义务就是这种私权的体现。国王的宗主权范围是有限的,在这一范围内,还谈不到国家政治统一和权力集中。第二类是国王代表“国家”行使的君主权,它具有公权的性质,在公权的范围内,理论上不允许在国王与臣民之间有任何居间的权力存在。君主权的发展表现为国王在整个王室领地内建立地方区划,由自己任免地方官吏,治理地方财务,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健全各种政府官僚机构,建立由国王统帅的常备军,等等。在王权的发展中,国王一方面利用市民阶级的力量,一方

面运用自己的宗主权力,加强对贵族的控制,不断促使宗主权向君主权的转化^①。到 14—15 世纪,西欧的国王已经基本摆脱封君封臣制的影响,开始经常强调全国的臣民都归他统治,都应供养国王和他的政府。而到了 16—17 世纪国王终于摧毁、瓦解了西欧的诸侯邦国和教会的普世性权力,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

从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的意义来看,王权的运动实际上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不错,西欧社会的现代化是市民阶级发动的,它们追逐利润、发财致富的市场活动自下而上,由里而外松动了封建主义的樊篱,蚕食着传统社会的结构,但是它们却无力改变当时割据纷争的分裂动荡局面。恩格斯说:“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②因此,尽管市民阶级为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提供了物质与精神的基础,直接促进民族国家形成的却是王权。

王权在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中的作用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第一,推动近代主权国家的建立。主权的第一个属性是它的地位,它是政治法律体系中的最高的管辖权力;第二个属性是它的次序,它是政治法律体系最终的决定权力;第三个属性是它的效力,它是一种影响一切的普遍权力;第四个属性是自主,统治者与其他机构的关系上(内部的和外部的,国内的或国外的机构)必须享有独立性,不能隶属于它们,即它是一种独立自

^① 参见沈炼之:《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453 页。

主的权力^①。王权在破除封建割据与对抗罗马教皇的斗争中取得了体现主权并行使主权职能的地位:它拥有最高的最终的权威,以王权为中心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行政和军事机构;它拥有普遍的自主的权威,以王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体不受各邦诸侯和封建领主的约束,它的权能一直渗透到基层单位。这种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具有极大的意义,当一个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还不能通过利益、即自然的经济手段来实现社会的整合时,它就只能依靠政治强制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整合,中央集权政体正好起到这种作用。君主主权推动着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使分裂离散的社会通过建立统一的政治体系而结成日益紧密的整体。

第二,推动民族认同的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意味着一个领土相对完整的主权独立国家,它为不同地区民众之间的交往提供了统一有序的空间。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加强,民族语言不断使用传播,文化教育迅速发展普及,特殊主义濒临危机,普遍主义日益盛行,民众也逐渐摆脱狭隘的地域、种族观念,统一的整体的民族意识开始产生,民族情感大大增强。民族主义破土之初以及后来相当一段时间,王权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一方面表现在君主领导民众抵抗外敌入侵时客观上具有民族自卫战争的意义,另一方面表现在君主专制时期对重商主义的鼓励满足了国内市场需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国家是以君主为中心来组织运转的,合乎逻辑地,王权便成为国家的标志和象征;又由于王权的利益具有超越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和地方利益之上的普遍性质,王权便成为民族利益的体现者和维护者。这样,对国家和民族的效忠就体现为对君主的效忠。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拥戴国王而认同国家,通过认同国家而培育民族

共同体,这就是西欧民族形成的重要途径。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以王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体实现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并在统一的环境下促进近代西欧民族的形成,这只是为日后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开辟了道路,它本身还不能称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只能称为“王朝国家”(dynasty-state)。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而王朝国家的建立只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开始而非这一过程的终结^②。这并不难理解。从王朝国家的政治主体看,它是以专制王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国王视国家为私产,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并没有形成所谓“次级体系的自主性”,仍然是附属于国王统治的工具。当国家的居民为专制统治下的臣民,而不是具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的独立的公民时,它们就很难产生或很难保持热爱与忠诚“祖国”的强烈感情,而这种感情正是民族国家建立所要动员的必要的资源。王权的基本矛盾是,它是与市民阶级(资产阶级)完全不同品格的一种力量,它运动的内在机理是专横与秩序,而市民阶级要求的则是自由与市场。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前面谈到的由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转变过程的第一阶段,王权何以能够与市民阶级同枕共眠,而一旦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市民阶级要求瓦解自耕农经济,把农民转变为雇佣劳动者时,王权与市民的蜜月就结束了。

王权已经成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绊脚石,王朝国家再也不能象它从前声称的那样体现着和代表着市民利益和要求。经

①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5页。

② 参见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世界历史》杂志,1994年,第4期。

济上的冲突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变革。市民阶级以全民族的名义展开对专制王权、对王朝国家的批判,提出自由、平等、人权、幸福的要求,并试图用这些新的政治原则、政治观念去构建新的国家——民族国家。

西方政治发展的这一逻辑在英国最为典型。在英国,民族国家的降生是通过市民阶级(资产阶级)与贵族结盟打击专制王权以加强国会的力量而实现的。这里需要对英国的贵族作一点分析。和封建时期的整个欧洲一样,英国贵族一开始就是王权的叛逆,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使国家分裂。但是贵族与王权的斗争也留下一些积极因素,这就是限制王权,确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权利与义务的范围,这与东方农业社会国家的君臣关系很不一样。1215年的《大宪章》以及等级议会就是贵族抗争王权的两项最重要的成果。只要翻开《大宪章》,就不难发现,国王权力受到制约,国王若违反法律,贵族则有权拿起武器驱除暴君,因而议会实际上也是国王与贵族政治妥协的机构。这些均对以后英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批贵族(亦称旧贵族)命运多舛,1455—1485年的蔷薇战争把他们卷进去,在诸侯的自相残杀中竟至灰飞烟灭,全部覆亡。都铎王朝由此而起,专制王权得以建立,接下来的斯图亚特王朝则把王权的专制发扬光大,推向极致。我们前面说过了,这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起步,再走下去,就成为社会继续前进的阻碍。事实上,斯图亚特王朝不久就有了麻烦,表现在土地政策方面就是对“圈地运动”的抵制。自耕农是王权的社会基础,然而,市民阶级却要把普通农民从土地上驱赶出去。在这股农业资本主义化潮流中推波助澜的主要是新出现的一批上层土地贵族,他们与蔷薇战争中垮掉的旧贵族不同,很早就适应了商品化趋向的世界,“早在国内战争(资产阶级革命——引者注)之前就

已经大力发展了他们的经济基础,而这个基础又使它(国会——引者注)处于同王权势力相对抗的地位”,他们“起着资本主义商品化和工业化的政治先驱的作用”^①。贵族的商业化构成了市民阶级与贵族联盟的基础,他们携手并进,依恃着强大的财力,迫使国王最终只能限制圈地运动的速度,而不能消灭它。这样,“当公有地逐渐消失,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在农村中开始取得优势时,旧有的农业结构便最终崩溃和瓦解了”^②。按照巴林顿·摩尔的观点,这在政治上意义也许就在于重创了王权而使国会的力量得到了加强。现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提出了一个至为根本的要求,即承认议会的传统权利,这些权利据说“自古就有”,最核心的是两条,一是“王在法下”,二是“王在议会中”。这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框架的产生,在这一政治框架中,国王的权力源自议会,国王只有服从议会的法律才能享有王位,国王的权威只有“在议会中”才能体现出来,才能合法有效地行使。换句话说,是议会缔造了国王,议会既然可以缔造国王,当然也可以废除国王。于是,议会便成了国家的主权。只有议会主权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建设才算走完了具有根本性历史意义的一站。

(本文责任编辑:沈雁南)

①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20页。